

语言间性·文化间性

翻译学

**编者按:**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纯粹语言(语音、语调、词汇、句子和语篇)转换,往往关涉文化、思维等重要因素。本期刊发伍小君老师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批判与反思》和姜菲、董洪学老师的《翻译中的显化思维和方法》。两篇文章正是上述学术理念的部分体现。

##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批判与反思

伍小君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410081)

**提 要:**自文化学派及其“文化转向”的翻译思想形成以来,学术界对其争论不休。翻译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这一转向进行反思,但是很少提出对相关学科的借鉴意义。文化是人类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相关研究的广义语境和不可忽视的背景。本文反思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产生的起源与发展,学界对“文化转向”的评价,尝试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语言哲学;语境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9)04-0103-3

### The Culture Turn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Wu Xiao-ju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cademic circles have argued against cultural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ts 'cultural turn' since it formed a kind of trend. Some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cultural turn', but we have seldom seen reflection and reference about i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ociety, culture is the essential background of language studies. This article reflect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riticism for 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eanwhile, we try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other relative field.

**Key words:** cultural turn; translation studie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ontext

#### 1 文化转向反思

##### 1.1 起源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作为描述学派的前身,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某种特殊的体裁(genre)上,而是着眼于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Zohar在研究文学翻译时认为被翻译的文学在以下三种情况中占有重要地位:“(1)当一个国家处于年轻阶段或是刚刚建立;(2)当某个国家的文学很薄弱的时候;(3)当某个国家的文学正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李和庆 2005: 106)。虽然他的翻译观已经体现出对目的语(target language)和目的文化(target culture)的关注,但是并没有使翻译研究走出

语言学派的束缚。因此,多元系统理论通常被看作是温和的文化派,强调翻译活动应有目的文化的各个系统决定,强调翻译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对此,Bassnett批评道,“过于重视目的文化,过于重视意识形态问题,而忽视了美学与价值观的方面”(Bassnett 1998: 107)。

此后,以 Toury和 Hermans为代表的描写学派(descriptive studies)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探索如何接受目的语的文化背景条件与特征,研究文化交际的规则及翻译现象的规律,并提出描写性研究的重要性和以译入为导向的、功能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注重决定译作的产生和被接受的翻译常规和制约因素”(曾文雄 2006: 91)。尽管描写学派强调了目的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但没有注意到翻译活动本身对目的文化的影响。因此,仍然未能

在翻译界引起共鸣,影响力度不够。

直到20世纪90年代,“Lefevre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问题,即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而应把翻译看作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彭爱和 伍先禄 2008: 131)。“文化转向”从译者的主体性和目的文化的角度着手翻译研究,主要针对翻译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使翻译界的文化意识得到觉醒,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同时,Lefevre认为,“翻译不是一种孤立的活动,必须发生在某种语境中”(李和庆 2005: 130)。于是,翻译研究经历了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的字面诠释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彭仁忠 2008: 122)文化学派的特点就是结合特定的文化动机和文化后果来研究翻译。“文化学派出于翻译哲学的思考,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影响,把翻译看作宏观的文化转换。”(曾文雄 2006: 92) Snell-Hornby (1990)写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研究与文化交叉,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把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分析的境域中解救出来,将它与其他学科相联系”(李和庆 2005: 129)。

### 1.2 概念

“翻译的文化转向与哲学上的语言转向不同。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翻译研究深化的过程。但它不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吕俊 2004: 54)。

Bassnett坚决支持 Lefevre有关“翻译研究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说法,他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的7个主要问题作了详细论述:语言与文化;翻译的类型;解码与重组;等值问题;意义的丧失与获得;不可译性;科学还是“次要活动”(Bassnett 2002: 22 - 46)。在不可译性的问题上,Bassnett认为,译者应在语言层面上接受源语言(source language)在目的语中的不可译性;接受目的语中缺少与源文化中相似习俗的现象;考虑目的语中可使用的对应语,并考虑源语言使用者的阶级、地位、年龄、性别、与听话者的关系,还有相遇时的场景;考虑短语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在特定的语篇系统和语篇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中,用目的语代替源语短语中的恒定信息(Bassnett 2004: 29 - 30)。此外,根据 Bassnett的观点,试图把源文化的价值体系强加在目标语文化中的行为是很危险的,译者应该要尊重目的语文化,对目的语的读者负责。

Bassnett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廖七一 2001: 360)。从文化的角度看,翻译实际上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不同的源语文本,“文化会赋予其翻译以不同的功能,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

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廖七一 2001: 365)。

文化学派的翻译观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文化学派从文化这一宏观维度切入,认识到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制约作用;(2)文化学派提高了译者与目的文化的地位,颠覆了以往将翻译工作视为低等活动的观点;(3)文化学派将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以字、词、句、篇为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

### 1.3 影响与评价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既表达文化现实,又体现文化现实,而且象征文化现实,那么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进行口头或书面交际时所隐性呈现的必然是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孙广治 2008: 98)。语言与文化就像是共享器官的连体婴儿,离开彼此都不能独立生存。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评价。Simon认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Simon 1996: 7)。“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相互影响与制约的翻译活动,勾勒了翻译学研究的框架,为翻译学提供新的研究范式”(曾文雄 2006: 90)。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国际译界的一场革命(Gentzler 1993: 77)。其中,改写(rewriting)和女性主义(feminist)就是受“文化转向”而产生的两个重要分支。持改写(rewriting)观的学者认为,“翻译不是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等值的产物,而是一个复杂的原文改写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语言观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平衡同步”(李和庆 2005: 131 - 132)。女性主义学者 Simon认为,“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转移,而是意义创造的过程,是意义在文本与社会话语网络下的循环”(Simon 1996: 35)。女性主义认为,经过80年代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彻底从忠实于原文的乌托邦中走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翻译被看作是在特殊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对原文的一种改写。这种改写也暗示了译者的主体性。女性主义学者的进步表现在他们不仅重视目的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而且关注到译者自身的文化对译文产生的影响。这样,译者的主体性通过译者自身的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凸显。

我国学者王佐良在80年代就曾指出,翻译里最难的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是翻译的起源,翻译也正是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因此,翻译研究就不能脱离这个宏观维度。翻译的“文化转向”凸显了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为翻译研究加入了人本主义的因素。

## 2 文化转向批判

Holmes指出,“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展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Holmes 1972: 71 - 78)。显然,“文化转向就是对上述两个宗旨的探索。正如 Bakhtin所说,“语言不是死物,它是总在运动着、变化着的对话交际语境”(辛斌 2002: 4)。而文化作为广义语境与语言研究密不可分,自然也就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参数。文化作为动态的、言外的和隐性的语境,是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对应的广义语境。源文化、目的文化以及译者自身的文化,甚至翻译赞助人的文化都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当然,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博的。多年来,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 200种,但仍然未能得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赞成 Wittgenstein的观点:文化就是生活形式(form of life)。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甚至有学者认为“语言就是一种文化”(裴文 2000: 178)。文化语境无处不在,它在整体上制约全部的言语活动,对语言的具有最终解释力。例如,汉语中的“爱屋及乌”对应英语为“Love me, love my dog”。这就与英语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在对同一事物的词的解释力。象这样需要文化来解释的翻译现象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列举。

简单地讲,翻译就是名称与对象的指称关系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转移。语境是确定名称与其指称对象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名称才能具有确实、有效的意义。既然,文化作为语境的最大维度,无时无刻不体现在语言的所有使用中。那么,它就是所有语言研究不可忽视的维度,翻译学也不例外。

“文化转向”固然也有些许不足,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这对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教学都有很大的启示。同时,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原文是由作者写成的,翻译过程是由译者来完成的,因此必然要考虑到人因素(human-factor)。语言哲学关注人及其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译者对作者创造的文本世界的阐释。而在这个阐释的过程中,源文化、译者自身的文化与目的文化三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3 结束语

文化是人类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相关研究的广义语境。本文通过反思“文化转向”的起源、发展、影响以及学界对“文化转向”的评价,尝试为相关学科

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虽然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但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了以往的理论成果。它不仅满足当前研究需要,也是对现有理论的必要补充,并与它们一起构成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当然,象其他的理论一样,“文化转向”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人——作者与译者自身,都受到更多的关注,成为当前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

## 参考文献

- 李和庆 黄皓 薄振杰. 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 70年代以后[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廖七一.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吕俊. 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 外国语, 2004(4).
- 彭爱利 伍先祿. 论文化中心主义对中西跨文化翻译的操纵[J]. 外语学刊, 2008(1).
- 彭仁忠. 论异化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J]. 外语学刊, 2008(4).
- 裴文. 现代英语语境学[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 孙广治. 文化间性视域中的杂合翻译策略[J]. 外语学刊, 2008(5).
- 辛斌. 巴赫金论语用: 言语、对话、语境[J]. 外语研究, 2002(4).
- 曾文雄. “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 外语学刊, 2006(2).
- Bassnett, S.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ase for Doctoral Research* [A]. In P. Bush & K. Malmkjær (eds). *Rimbaud's Rainbow*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Holmes, J. *The Natur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The Hague and Paris Bratislava: Moulton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72.
- 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n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收稿日期: 2008 - 10 - 13

【责任编辑 李洪儒】